

# 理解西方新政治经济学

宋胜洲

**摘要:** 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的兴起并兴盛是经济学和政治学相互关联、互动发展的产物,不仅体现了经济学研究范围和领域从经济福利扩展到经济权利,还体现了经济学研究主题从资源配置到权利配置的转变,这反映在新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三大问题之上:得到什么、得到多少、如何得到。西方政治经济学兴盛的趋势也为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建“以人为本”的中国政治经济学。

**关键词:** 新政治经济学 权利配置 以人为本

近来,一个被称为“新政治经济学(New Political Economy)”的新分支学科在国内外逐渐兴起,不仅引起了经济学家们的极大兴趣,而且还受到了政治学家以及政治家的广泛关注。在西方,以英国 Sheffield 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于 1996 年创办《新政治经济学》杂志为标志。在国内,不仅对西方新政治经济学进行了大力介绍,还对反思和重建中国政治经济学进行了有益的探讨,这以 2003 年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讨会的召开与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的成立、经济科学出版社“西方政治经济学译丛”的出版、2005 年浙江大学《新政治经济学评论》杂志的创办、长春出版社将“新政治经济学译丛”列入出版计划为标志。

那么,新政治经济学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经济学新分支呢?它与政治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又有什么区别及联系呢?本文在评述新政治经济学兴起和内容的研究目的和研究对象等方面来理解西方新政治经济学,并对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提出了一些思考。

## 一、经济学可以“纯粹”吗?

众所周知,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总是密不可分的。所以,经济学和政治学作为社会科学中最为重要的两大学科,自古以来也总是紧密关联、相互促进地发展着的。从经济学说史的角度来看,经济学与政治学经历了一个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发展历程。

### 1. 政治经济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的紧密结合

城邦是古希腊社会组织的基本形式,经济指的是“家庭管理”,政治指的是“城邦管理”。经济学与政治学并不是相互独立的两门学科,而是内生于城

邦学说之中,统一于在哲学范畴之内。所以,古希腊的先哲们,往往是既是经济思想家,又是政治思想家,如色诺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在 16 - 17 世纪重商主义兴盛的时期,经济活动的目标是增加财富,而政治的目标是保障财富的增加,而且前者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后者,即依赖于国家的作用。这时,经济学和政治学很自然地结合在一起了,因而被称之为“政治经济学”。

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获得了统治地位后,资本主义进入到了自由竞争阶段,崇尚国家权利的思想逐渐转变为保护个人权利的观点,即反对国家干预而倡导“自由放任”。但其研究对象依然集中在国民财富的生产与分配方面,并不是个人财富的增长,政治学与经济学的紧密结合状况并没有根本改变,经济学也仍然被称为政治经济学。不管是崇尚国家干预,还是主张自由放任,都没有回避政治与经济之间的紧密联系,只不过是政治主张不同而已。

马克思在批判地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提出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等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通过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的变革来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即通过政治来推动经济的发展。所以,马克思尽管反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自由主义,但并不反对政治学与经济学的结合,反而大大强化的两者之间的紧密关系,更加注重研究“生产关系”,而不是纯粹的“生产力”。

### 2. 新古典经济学:与政治学分离的“纯粹经济学”

被马克思批判为“庸俗”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在 19 世纪 70 年代的边际革命之后,以方法论上的个

人主义和心理分析的“理性经济人”假定为基础,大力引入数理分析方法,以价格、竞争等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作用,以及生产和分配的效率等作研究对象,力求摆脱价值判断、崇尚实证分析,逐步形成了一个形式化的公理体系,被披上了“硬科学”的外衣成为了经济学的“主流”和“正统”。这时,经济学成为了一门独立的科学,并与政治学彻底分离开来,名称也不再带有“政治”一词的限定,成为了其奠基人之一瓦尔拉斯所宣称的“纯粹经济学”,这以其集大成者马歇尔里程碑式的著作《经济学原理》的出版为标志。这就是说,经济可以脱离政治和社会制度而独立运行,可以假定的制度不变或者不对经济产生作用。

20世纪30年代的资本主义大萧条颠覆了“纯粹经济学”的迷梦,崇尚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成为了居于主导地位的思潮。经济学也随之分裂为以整个国家经济状况为研究对象的宏观经济学和专门研究个体经济行为的微观经济学两门经济学。尽管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再次紧密起来,但大多数经济学家仍然坚信国家干预只是暂时的、特殊的现象,其前提是仍然是保障以个人自由权利为基础的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所以,他们所追求的目标仍然是一般的、“纯粹”的经济学,尽管已经无法做到纯粹。

### 3. 新政治经济学:“政治的经济学”与“经济学的政治学”

随着干预主义的盛行,政府经济活动的范围和影响日趋扩大。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三个年轻的美国经济学家阿罗、萨缪尔森和布坎南(他们后来都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将日趋成熟的经济学分析方法应用于政治领域,后来发展成为社会选择理论、公共物品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被称之为“政治的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ics)。80年代以来,经济学出现了制度主义的复兴以及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同时,政治学也出现了由行为主义重新到制度主义的转向。到了90年代,这方面的研究更为兴盛,研究范围扩大到了政治活动以及国际政治对经济的影响等方面,形成了“经济的政治学”(Economic Politics),并正式提出了“新政治经济学”。

从本质上看,经济学研究的是在资源约束条件下的个人选择问题,政治学研究的是个体权利冲突下的集体选择问题。进一步地,传统政治经济学主要研究的是个体选择如何依赖于集体选择,即经济决策如何被政治决策所影响,这可以理解为“经济的政治学”,而新政治经济学不仅研究政府以及政治活动对经济影响即“经济的政治学”,还研究集体选择如何在个体选择基础上形成的问题,即“政治的经济学”。也就是说,传统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结果问

题,新政治经济学还要研究原因问题。在现实中,两者无法完全分开,所以企图否定政治影响的“纯粹经济学”逐渐式微,这正是新政治经济学日益兴盛的缘由。

## 二、研究范围:从个人权利到国家权利

目前,西方新政治经济学还处于形成的过程之中,并没有建立起统一的理论框架,其研究的内容和范围也不尽相同,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界定,大致有四种不同的界定方法:布坎南认为应该包括公共选择理论、产权经济学、法和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规制经济学以及新经济史学等六个方面;盖保尔认为应该包括国际政治经济学、国家理论、比较政府-产业关系、公共选择等四个方面的内容;《新政治经济学》杂志编辑部界定为比较政治经济学、环境的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等四个方面;莱尔和明特则界定为社会选择理论、公共选择理论以及制度和组织经济学等三个方面。

我们认为,对新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围的界定尽管各不相同,但其联系大于区别。相对来说,莱尔和明特的界定更为合理,但还需要加上国际政治经济学。大致来说,我们认为其研究范围应该包括四个方面:一是以阿罗、森为代表的福利经济理论或社会选择理论;二是以布坎南、图洛克和奥尔森等为代表的公共选择理论或公共经济理论;三是以科斯、诺斯等为代表的制度经济理论;四是研究国际经济和政治关系问题的国际政治经济学。

### 1. 福利经济理论:从物质福利到自由权利

作为福利经济学先驱者的霍布森,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一系列著作中论述了福利问题,认为经济学的中心任务应当是研究如何增进社会福利,同时主张改进财富分配以消除不平等现象。20世纪20年代,庇古提出用国民收入衡量的经济福利概念以及通过收入均等化和消除外部性等增进经济福利的办法,第一个建立福利经济学体系而被称为福利经济学之父。在基数效用理论和货币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基础上,庇古提出可以通过对富人征收累进所得税、高额遗产税等办法,以建立相应的社会保障和救济制度,将富人的部分财富转移给穷人。这被现代经济学称为“旧福利经济学”。

20世纪30-40年代,希克斯、艾伦、伯格森、萨缪尔森等从序数效用出发,以个人偏好为基础的社会福利函数为核心,强调以帕累托效率为标准来增进社会福利,即不降低任何人的福利来提高全社会福利,这被称之为“新福利经济学”。然而,不仅帕累托效率由于十分严格条件而难于在现实中实现(为此,经济学家希克斯、卡尔多、西托夫斯基、李特尔等

提出各种补偿标准),而且社会福利函数在严格意义上也不存在(即阿罗不可能定理),这导致了 50 - 60 年代福利经济学研究的沉寂。

一直到 70 年代以后,阿马蒂亚·森的贡献才重新引起了经济学家对福利经济学研究的兴趣,他也因此获得了 1998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森不仅发展了阿罗不可能定理,还进一步论证了帕累托效率和自由选择之间相矛盾的不可能定理。因此,福利经济学不能只是考虑个人偏好的加总,更应该考虑个人的自由选择权。进一步地,他还批评了新福利经济学将社会福利唯一地依赖于个人福利的观点,提出还需要考虑剥削、虐待等对个人福利有利但对社会福利不利的道德问题。除了对新福利经济学理论进行批评之外,森还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概念,如能力、权利和自由的概念替代传统的效用概念。我们认为,正是因为自由与权利的概念取代了效用和福利的概念,森将福利经济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不妨称之为“后福利经济学”。

由此可见,福利经济理论的发展使得经济学的研究目标从经济福利转到了追求自由权利。然而,对权利的深入研究主要体现在公共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领域。

## 2. 制度经济理论:从物质交换到权利交换

从发展的历史来看,制度经济理论有两种不同的研究传统,即以凡勃伦、康芒斯、加尔布雷斯、霍奇逊等为代表的制度主义的演化分析传统和以科斯、诺斯等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的均衡分析传统。在这里,我们主要指后者,即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理论、契约理论、企业理论、国家理论、制度变迁理论以及法律经济学等广义上的新制度经济学。

科斯首先提出了交易费用的概念并因此产生了产权分配作用,即科斯第二定理。在本质上,市场上产品或要素的交换乃是权利的交换,产品的交换是所有权交换,劳动力等要素的交换是使用权的交换。要素所有者之间关于要素使用权转让的一组契约构成企业的本质,即企业的契约理论。企业的所有权作为交易的对象成为要素所有者出让所有权的一种间接定价,即以要素所有权交换企业所有权。简单来说,制度就是权利交易的合作规则,包括正式规则即法律和非正式规则即文化、习俗、道德等。企业、家庭、市场乃至国家、非营利性组织(NGO)都是以权利交易为基础的合作组织,是制度的具体体现形式或合作的具体形式,并由此而形成了人们合作的秩序。总而言之,制度就是人们权利交换的规则。

## 3. 公共经济理论:从私人权利到公共权利

顾名思义,公共经济理论不仅涉及经济理论,必然也会涉及政治问题。制度经济理论研究的是个人

之间的权利交换,公共经济研究的是个人与集体之间的权利交换。从其理论渊源看,公共经济理论不仅起源于经济学上的维克塞尔、林达尔和意大利公共财政理论,也起源于政治学上的霍布斯、斯宾诺莎等人的政治哲学和汉密尔顿和麦迪逊等人的政治联邦主义。

在狭义上,公共经济理论就是指公共选择理论。它起源于 20 世纪 40 年代末,到 60 - 70 年代逐渐成熟,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并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学派,布坎南、塔洛克、奥尔森、缪勒是主要代表人物。在方法论上,主要是坚持个人主义、经济人假定、交易政治观,研究的领域主要涉及投票规则、官僚体制、寻租理论等,分别研究如何通过投票把个人权利转换为公共权利、公共部门是如何进行规模扩张和公共权利如何被滥用等。

在广义上,公共经济理论除了作为理论基础的公共选择理论之外,还包括市场失败以及政府规制理论、公共财政理论、政治的经济影响等。一般地,公共选择理论主要是研究公共权利如何得到的问题,市场失败理论主要是研究对公共权利产生的原因,公共财政理论主要是阐述公共权利的经济基础和实际操作工具的运用,政治的经济影响主要研究各种政治干预活动以及其他政治活动对经济运行的影响。市场失败根源于帕累托最优状态的在现实中遇到的障碍,比如垄断、外部性、公共品、信息不对称以及由此产生的宏观波动、失业、贫困等问题。这导致了政府干预的必要,如微观规制、宏观调控和社会管理等。这些公共管理活动以及其他政治活动往往会对微观经济行为和宏观经济运行产生重大影响,比如规则与不规则政策对经济行为预期的不同影响、政策实施过程中的时间不一致问题、政治选举形成一定经济周期等等。政府公共职能的实现还必须依赖一定的经济基础,即公共财政及其预算。税收和公债既是公共收入的途径,也是公共政策的工具。同时,公共支出不仅维持了政府的运行,也构成公共政策的工具,如转移支付、公共工程等。

## 4. 国际政治经济理论:从国内权利到国际权利

当经济活动跨越国界成为一种国际经济活动时,国际政治经济问题也就随之产生。作为专门研究国际经济活动的分支学科——国际经济学一直伴随着经济学的发展,而专门研究国际经济活动中权利问题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在 20 世纪 70 年代才兴起,这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冷战局势和当前的全球化潮流密切相关。国际政治经济学将对一国之内权利冲突关系的研究拓展到了全球化背景下的各个民族国家之间以及地区之间,主要研究国际经济交换和合作中的剥削、掠夺问题、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

家的依附关系以及核心 - 边缘关系、地区冲突与区域合作、国际组织和区域组织的作用等国际经济秩序问题、跨国公司的影响和作用、全球化的影响等等。总之,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乃是国家间的权力和利益的矛盾和冲突。

### 三、研究对象:从资源配置到权利配置

从以往对西方政治经济学的由来和研究范围的评述,我们可以从研究目的、研究对象、研究问题以及研究的方法等几个方面来理解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内涵。

#### 1. 研究目的:从物质福利到自由权利

自形成以来,经济学一直在探讨其研究目标的问题: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看来是追求国民财富的增长,在新古典经济学看来是效用的增加(不论是基数的还是序数的,都是财富或物质所给予人们心理上的满足),在旧的和新的福利经济学看来是经济福利的增进(物质财富的增加既可以提高个人的效用,也可以增进社会福利)。但在森看来,效用和福利的增进并不仅仅依赖于对物质财富的消费,还依赖于个人的特征和所处的状态。因此,他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概念,作为经济学研究的目标,如能力(个人实现有价值功用或获得生存状态的机会)、功用(人应当享有的权利及其所能得到的作用作为衡量幸福和快乐的标准)、权利(饥荒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人们失去了获得食品的权利)以及自由(包括免受困苦的基本能力以及能够识字算数、享受政治参与等自由)。这些概念是不断深化的,是其福利经济思想不断深化的标志。他最后提出了自由权利概念,即人们不受物质和精神约束而自由享受的权利,是人们追求的最高境界,这正如马克思所阐述的“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从本质上看,财富之所以可以给人带来福利,并不只是其自然特性(可以用于消费),更依赖于其社会特性,即可以自由地支配其权利,既可以用于消费(使用权),也可以用于交换(转让权),还可以用于增值(收益权)。否则,在效用边际递减规律作用下只能获得消费上的帕累托最优,必须通过自由支配权利才能获得总体上的帕累托最优。所以,自由权利才是经济学要研究的最终目标。

#### 2. 研究对象:从资源配置到权利配置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资源配置问题,这是基于物质世界的资源相对于人们无限欲望来说总是稀缺的,因而需要人们将这些稀缺的资源合理配置到其最需要的地方或环节中来实现其最大化利益。并且,新古典经济学论证了“看不见的手”即价格和竞争等市场机制,可以在每一个体最大化利益的基础上实现总体上资源配置的最优状态。

但是,这一资源配置的最优结果只是否定了帕累托改进的可能,而且这还依赖于人们最初拥有的资源状况以及利用资源获利的机会。不同的初始状况,例如,财富多少、能力高低、受教育的机会、谈判力量、信息状况等,决定不同的帕累托最优状态。一旦人们的初始条件改变,就可能实现更高水平的帕累托最优。问题就在这里,人们的初始条件无法自由选择,而是先天地决定于自己、父母以及社会,因而个人无法通过改变初始条件来增进福利,除非采取非法的抢夺、偷窃(这是非帕累托意义上的改进)。于是,社会要在帕累托意义上增进总体福利,需要用公共权利来调整个人的初始状况,并通过制定行为规则,规范个人的权利和公共权利以防止其滥用损害到他人的权利。这就是所谓的权利配置(包括个人权利的配置和公共权利的配置)。当然,这是一个规范性的问题,包含了一定的价值判断。

#### 3. 研究主题:三大问题

对应于新古典经济学以资源配置为研究对象所提出的经济学三大问题(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为谁生产),我们也可以将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问题归结为下面三大问题:得到什么,得到多少、如何得到。得到什么的问题就是前面所述福利经济理论所阐述的自由权利的经济目标问题。得到多少的问题就是权利配置,每个个人都平等地获得其相对应的经济权利以及如何通过放弃一定的个人权利以获得相应的公共权利来配置总体的权利,其中制度经济理论解释个人权利的配置问题,公共经济理论解决公共权利的配置问题,国际政治经济学阐述国际权利的配置问题。如何得到的问题则是制度经济学所要解决的,如何通过合理的规则来规范人们之间的权利交换,并形成一定合作组织和合作秩序,以实现各自的以及共同的利益。

#### 4. 研究方法:从实证分析到规范分析

正如前面我们所论述的,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目标和对象是政治学意义上的权利概念,这就不可避免地要进行一定的价值判断,比如维护谁的权益,保护什么权利等,尽管分析上采用了一定的实证方法,但本质上还是一个规范问题,不可避免地涉及规范分析方法。进一步地,新政治经济学是规范意义上的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是实证意义上的经济学。只有两者相互补充和相互结合,即“纯粹经济学”加“政治经济学”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经济学体系。

### 四、对中国的启示

新政治经济学在西方的兴起并兴盛反映了经济学在本质上无法真正地完全与政治学相分离。所以,经济的背后总是不同程度地包含着一定的政治

内涵,经济学在某种意义上仍然是政治经济学,应该回到政治经济学的传统。这也许就是马克思“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基本命题和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而不仅仅是生产力的现代西方经济学翻版。在这一意义上,无疑对我国的政治经济学发展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启示,即重建“以人为本”中国政治经济学:(1)“以人为本”的社会选择。从马克思的观点来看,经济学的目标乃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用我们现代的术语来说就是“和谐社会”,即在自由、权利和发展意义上的和谐发展。“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和谐社会”在“以人为本”的本质上是统一的,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表现为可持续发展和循环经济;另一方面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统一,表现为城乡协调、地区平衡、社会公平(包括教育机会公平、就业机会公平、收入分配公平、社会福利公平等)。(2)“以民为本”的公共选择。以“政治文明”为目标,建设“以民为本”民主的公共经济管理模式,改革现有的公共经济管理体系:健全以公共财政为目标的中央及各级地方财政、税收和预算体制;建立包括微观规制、宏观调控和社会管理的公共政策体系;健全包括国土、矿产、生物、环境等自然资源管理体制;健全包括国有工商企业、国有金融企业以及行政事业等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健全能源、交通、电信、市政等基础产业体系和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体系。(3)改革的制度选择。深化和完善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及其相关的政治以及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继续以渐进的方式、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局部试点和全面推广相结合、由点到面的全面深化体制改革;继续深化国有企业体制改革和相关的国有资产体制改革;继续推进各项工商、贸易、金融、投资等各项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继续推进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继续推进劳动、社会保障、科教文卫等事业体制的改革。(4)开放的国际选择。顺应全球化的发展潮流,全面遵照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和我国的承诺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发展国际贸易、国际投资以及技术、文化等交流与合作,既要积极开放,又要合理保护;积极争取国际和平环境和地区的稳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提高综合国力,实现“和平崛起”,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中发挥政治和经济大国应有的积极作用。

#### 注释:

参见方福前:《西方新政治经济学述评》,载《教学与研究》,1999(3);杨龙:《从政治经济学到新政治经济学——西方政治经济理论的演变》,载《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1);王小文:《政治的经济学和经济的政治学——西方新政治经济研究综述》,载《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1);陈振明、黄新华:《政治经济学的复兴》,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1);黄新华:《当代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的兴起》,载《天津社会科学》,2005(1);陈银娥、秦静:《西方新政治经济学述评》,载《当代经济研究》,2005(6)。

参见程恩富、王小文:《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与我国政治经济学革新》,载《政治经济学评论》,2003年第1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汪丁丁等:《新政治经济学的可能依据:行为和意义的综合视角——汪丁丁、罗卫东、叶航三人对谈录》,载《浙江社会科学》,2003(6);汪丁丁:《中国的新政治经济学的可能依据——行为和意义的综合视角》,载《社会科学战线》,2004(3);戴敏敏:《新政治经济学价值及其适用于中国的原因》,载《学术月刊》,2004(10);刘建兴:《新政治经济学及其在发展中的应用》,载《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5(1)。

参见方福前:《西方新政治经济学述评》,载《教学与研究》,1999(3)。

从诺思由一个制度供求分析者转变为一个路径依赖的研究者可以看出,这两者已经逐步走向融合。

王勇:《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新进展》,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5)。

Sen, A. K., 1981. *Poverty and Famines: An Essay on Entitlement and Depriv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中文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在这种意义上,帕累托改进乃是指在尊重他人权利的前提下增进自己的利益。

#### 参考文献:

1. Andrew, Gamble, 1995. "The New Political Economy." *Political Studies*, No. 3.
2. Gilles, Sant - Paul, 2000. "The 'New Political Economy': Recent Books by Allan Drazen and by Torsten Persson and Guido Tabellini."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xxxviii, pp. 915 - 925.
3. Sayer, Stuart, 2000. "Issues in New Political Economy: An Overview." *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 Vol. 14, No. 5.
4. Torsten Persson and Guido Tabellini, 2000. *Political Economics: Explaining Economic Polic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5. 汉斯·范登·德尔·本·范·韦尔瑟芬:《民主与福利经济学》,中文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6. 陈振明:《政治的经济学分析——新政治经济学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7. 阿伦·德雷泽:《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中文版,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8. 克拉克:《政治经济学——比较的视点》,中文版,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9. 约翰·N·德勒巴克、约翰·V·C·奈:《新制度经济学前沿》,中文版,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10. 查尔斯·林德布罗姆:《政治与市场:世界的政治-经济制度》,中文版,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北京 100872)  
(责任编辑: S)